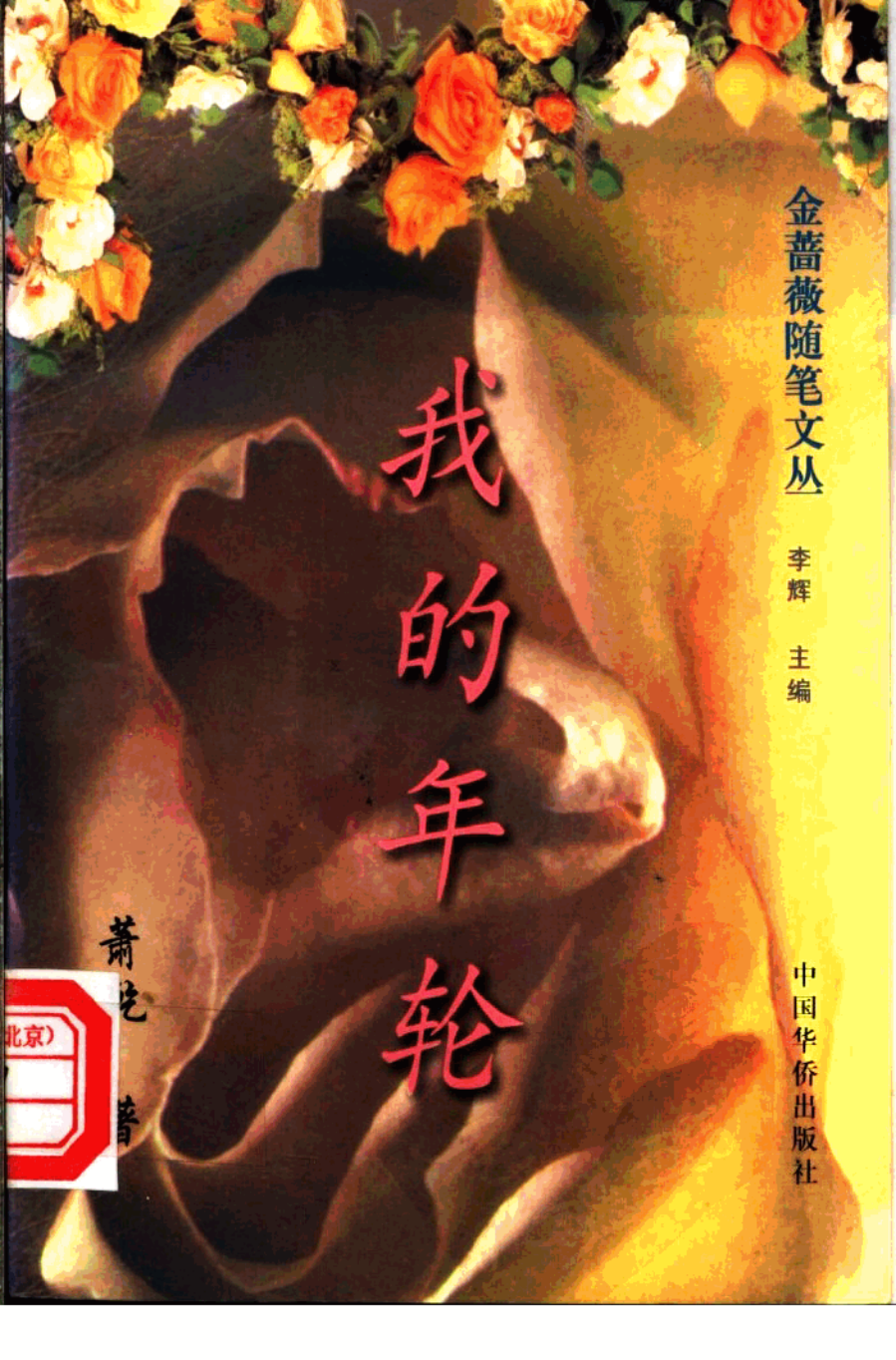




金蔷薇随笔文丛

李辉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我的年轮

萧乾

著

北京)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一辑)

- | | |
|----------|-----|
| 《古稀手记》 | 于光远 |
| 《画中思》 | 吴冠中 |
| 《榆树村杂记》 | 汪曾祺 |
| 《山外青山》 | 林斤澜 |
| 《乱侃白说》 | 蓝翎 |
| 《改写圣经》 | 邵燕祥 |
| 《秋天的音乐》 | 冯骥才 |
| 《沉默交流》 | 刘心武 |
| 《我眼中的风景》 | 应红 |
| 《女人是水》 | 李建永 |

ISBN 7-80074-884-7



9 787800 748844 >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 | | |
|-----------|-----|
| 《我的年轮》 | 萧 乾 |
| 《花椒红了》 | 梅 志 |
| 《苦瓜的味道》 | 李 锐 |
| 《你,可爱的艺术》 | 黄宗江 |
| 《历史的踌躇》 | 孙越生 |
| 《未了斋杂碎》 | 袁 鹰 |
| 《有戏没戏》 | 舒 展 |
| 《诸神下凡》 | 王 蒙 |
| 《秋天的情绪》 | 舒 婷 |
| 《乘火车旅行》 | 王安忆 |



《金蔷薇随笔文丛》总序

李 辉

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

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起承转合的所谓匠气，画龙点睛的所谓技巧，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来代替“散文”。

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同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金蔷薇随笔文丛》的行列。

“金蔷薇”，前苏联作家创造的书名，对于我们，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意象。

以这个美丽的意象命名的这套文丛，将把随笔领域纷呈的美汇集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不应是单一意义上的美。文字、思想、学识、人生体验，都有美的内涵。沉静、淡泊、热情、幽默、讽刺、鞭挞、细腻、粗犷……一切都没有定型，一切都不会定型。

生活在流动，美在流动。随笔的创造也在流动。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美。

愿我们的“金蔷薇”在流动中散发出它们的芬芳。

目 录

序.....	(1)
旅居上海的日子.....	(3)
我失过业.....	(7)
筵席终于摆成了	(12)
从长沙到沅陵	(14)
雾搬了家	(17)
给青年朋友们	(21)
五福堂	(24)
天体	(28)
劝君惜齿	(32)
怀念我那个小本本	(34)
我的孩子们	(36)
一个出汗主义者的自白	(38)
我羡慕孟母	(42)
东直门	(44)
视与见,听与闻.....	(47)
誓言	(49)
我的书房史	(52)
我的年轮	(56)

更重大的贡献	(59)
一阙悲怆协奏曲	(64)
《猴娃》好看	(68)
长沙出版界四骑士	(70)
我下辈子想干什么?	(84)
一本别致的文集	(87)
“真”是散文的灵魂	(89)
我们这家夫妻店	(91)
释“地图”	(96)
遥远的祝福	(100)
遥寄台湾读者	(103)
心中总有一团火	(105)
序《三天旧梦》	(107)
悼子野	(108)
悼尊祺	(111)
“同派之雅”话张权	(116)
悼艾克敦	(119)
三姐常韦	(124)
文学翻译纵横谈	(149)
文学翻译琐议	(152)
叛逆·开拓·创新 ——序《尤利西斯》中译本	(156)

序《我的年轮》

萧 乾

这是我最近一两年写作的结集。这三十八篇文章有谈出版的(《长沙出版界四骑士》),有谈外国文学的(《叛逆·开拓·创新》),还有一篇较长的回忆文章(《三姐常韦》)。很难为这样的集子写个序,况且这里的文章都不需另作说明。我想索性借此机会同读者谈几句有关老年生活的话。

我顺小就喜欢活物。二十年代,每逢去趟隆福寺或护国寺,必然带回一束最廉价的太阳花(当时俗称麻绳菜)或一只蝓蝓。如今,我还养着大小乌龟各一对,几十盆花木散放在家中各个角落。一闲下来我就浇花,喂食。我尤其喜欢用插枝的办法来繁殖。朋友送了我一盆海棠,如今我已经把它插成十五盆了。我管那阳台叫“海棠园”。

音乐就更不用说了。我简直很难想象没有了音乐我还怎么活。红卫兵砸了我几百张唱片,而如今的CD可远比唱片要好听——而且便当多了。我对这个家感到满足,因为我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我心爱的巴哈或莫扎特。以前“名洋古”犯忌。感谢上苍,如今可以放心地享受了。但愿那动不动就“修”的日子永远不再回来。

花和音乐固然对我重要，但它们都只是生命的点缀而已。我真正的爱好，是写作。一九五七年后，对那顶帽子以及随之而来的辱骂，我当然在意；但我更在意的却是笔被夺了去。那以后，这双手只能用来拔苗、插秧，不准再写东西了。

那阵子我确实羡慕文盲，后悔自己没一辈子干织地毯那个行当。七九年当那支笔又回到我手里时，我发誓再也不丢掉它了。因此，十几年来我除了考虑想写什么之外，还总要考虑有没有再一次丢掉笔的危险。我既要这支笔多少传达一些自己的心意，又得防备它走火，犯了时忌。对于五七年落过难的我来说，这种心情是极其自然的。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工作，就我而言，也是写作。所以这十几年，我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或译或写，并且希望能够写到最后一息。

写什么？我不大喜欢讲豪言壮语。但自知我已没有写《梦之谷》时的激情，也没有了写《篱下集》时的精雕细琢的能力，更没有写《一生采访》时那种驰骋中外的精力了。人老了，可又还没糊涂。眼下只能就我毕生经历的沧桑，写点人生小讽刺，成不了大气候，但如能多少有点辛辣味就足矣。

1994年11月7日

旅居上海的日子

最近台湾中国时报社出了一本散文集，其中介绍我时说：“萧乾，蒙族人，原名塔塔木林”。这真是个有趣的误会。可惜《红毛长谈》的编者李辉没向读者交代一下它的起源。我生平很少使用笔名。1946年写那组歪文时，我怕有人来复旦找我麻烦，才起了这么个怪名字。“塔塔”是我旅英时，每天帮我收拾屋子的一位东伦敦口音的妇女来去时向我打招呼的习惯用语，它既可以代替“早安”，又可作告别语。“木林”则出自上海话“阿木林”。1928年我第一次去汕头路过上海时，就有人这么喊过我。当时我不解其意，可听起来蛮顺耳。1936—38年住在上海，才知道这原是上海人对乡巴佬的别称。有人告诉我其中含有蔑意，但我一直挺喜欢它。因而就把它同“塔塔”衔接起来，成为笔名。

在上海，我的确一向是个阿木林。印象中，上海人都挺“帅”——这可是一句北京土语。用在服饰上就是穿戴时髦。放在举止言行上就是伶俐敏捷，可能还包含着有气派。在这些方面我恰好都不大灵。1928年我路过上海时，身上穿的是一件蓝布长衫，跟那大都会太不和谐了。新年又经沪回平时，我事

先倒是在汕头特置了一件廉价西服，可我不会打领带，因而就买了一只蝴蝶结。倘若它是套在脖子上的那种，也还不至于闹笑话。但我买的偏偏是旋转到螺丝上去的那种，而且挺松。走在南京路上，它老脱落。路人一指点，我就赶忙猫腰去把它拾起再安上，怎能不出洋相！

我有过好多上海朋友，可他们都会讲普通话。1936—37年在爱多亚路大公报馆编副刊时，排字工人又统统是从天津调去的。那阵子往来密切的，不是四川人（巴金、采臣和、马宗融）就是湖南人（黎烈文）、东北人（孟十还、杨朔和孙陵）、天津人（靳以）以及山西人（李健吾）。黄源讲的倒好像是上海话。可是至今我也辨别不出无锡苏州、杭州绍兴话同上海话之间的区别。1946—48年在江湾徐汇村，我的紧邻又是讲安徽话的方令孺。

三十年代旅居上海的文人，大都住在虹口、静安寺路或法租界的霞飞路，而且多是住亭子间。最初，我住的就是霞飞路上的一个白俄女人的亭子间。那有点像外国的廉价公寓，备有简单的家俱和被褥。街头拐角就是一家老虎灶，可以随时去打开水。有一回我索性住到一家罗宋（白俄）餐馆的楼上。这样，一个单身汉的切身问题就全解决了。夏天那家餐馆每天还包我两瓶凉开水——一直到有一回当那伙计正拿着我的瓶子在自来水笼头上灌时，给我撞上了为止。

亭子间窗下就是大门口。我楼上住的大概是个白俄舞女。深更半夜总有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往往是水兵）送她回家。两张嘴亲个没完。听那声音不但在吻，还互相啾啾。

法国国庆那晚，霞飞路灯火辉煌，我听到门前停着的一辆汽车下面有嗷嗷的叫声。原来是一只被压伤了腿的猫。我就

把它抱回亭子间。替它洗干净，养了起来。可它一能走路，就溜进房东太太的房间，并且撒了一泡尿。于是，那个胖女人就双手叉腰，堵着我的房门咆哮，逼我要么把它扔掉，要么立即搬家。

那时，杨朔和孙陵合办的北雁出版社正需要个房客。于是，我就住进他们那幢坐落在环龙路带阳台的二层楼房。楼下是出版社，楼上他们自己住。那时上午编刊物，下午总同巴金和靳以在大东茶室相聚。沏上一壶茶，从手推车上拣几样点心，就可以泡上大半天。盛夏的中午，常到八仙桥青年会去冲个冷水浴。然后仰坐在竹躺椅上吃“棒瓜”——比西瓜小多了又比甜瓜略大点，刚好够一个人吃的。离开上海之后，我在旁处再也没见过那样的瓜。

可惜好景不长。芦沟桥的炮火揭开了战争的序幕，紧接着就烧到了上海。我还挤到外滩公园看过中国飞机冒着炮火轮番轰炸日本旗舰“出云号”的雄伟场面。不幸，接着就是掉在大世界北面和先施公司后身的两颗炸弹。当时都离我不远。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成车成车支离破碎、血淋淋的尸体。那两颗炸弹也粉碎了上海租界可以是安全岛的迷梦。

我从小就爱逛庙。所以在上海时，城隍庙我是常去的，每去必吃几屉小笼包子。自然，我更常去的是二马路一个叫“耳朵腿”的黑咕隆咚的弄堂小店，那里可以边喝豆浆边嚼着刚出炉的烧饼和刚炸焦的油饼油条。

上海还联系着我大半生的感情生活。1936年，我在环龙路成立了第一个家。可是婚后不久，“小树叶”就去东京留学了。1946年，我又在江湾成立了第二个家。那个家不幸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遭到歹人破坏。我手足无措地抱着个几个月

的娃娃，仓促间在闸北又成立了第三个家。

在上海我有过欢乐，也有过苦痛。

我失过业

我早年失过学，后来又失过恋。活到二十七岁我才尝到失业的滋味。那以后，我就同“小树叶”过起流徙生活，从沿海到大西南，几乎跑了半个中国。那滋味就像原来踏着坚实的土地，忽然两脚悬了空。在写《未带地图的旅人》时，我有意无意地把这段经历略过去了。现在就来补记一下。

这是从胡霖社长的一次谈话开始的。

从打 1935 年进《大公报》编副刊起，胡霖社长对我的工作就一直给以支持，不时地加以鼓励。他的关心所体现的是他对副刊的重视。他说过报纸就是通过副刊同学术界、文艺界以及广大青年保持联系的。它比经济版或体育版的社会基础似乎更广泛，甚至档次也高一些。

可是 1937 年“八·一三”一声炮响，报纸马上由十六版缩至四版。当时报纸的读者唯一关心的只是战争打到哪儿了，那关系着国家的存亡，也更直接地涉及个人安危。因此，除了新闻版和报纸赖以生存的广告，其余各版都只好停了。当时报馆最活跃的是张蓬洲（杨纪）。他是报馆里唯一行伍出身的，还打过仗。我还跟他一道去过大场、吴淞，仿佛想改改行，试着当一

名战地记者，可不知自己能不能胜任。

正当我在彷徨失措时，胡社长把我叫到他那间小办公室去。他依旧是忠厚长者的神态和语气，先对我进馆后的工作讲了许多好话。我心里明白，那是为正文垫的底。果然他很快就转到战局上，说看光景上海的局面长不了，报馆的前途很难说。“我呢，只好混一天算一天。你年轻有为，应该保住自己。内地需要人才，不要陪着我们朽在这里。”接着又说报馆经济上目前如何困难，诉完苦之后，说只能给我半个月工资的遣散费，去自谋生路。

我走出他那间办公室之后，觉得眼前一片黑。半个多月前还是报馆的红人，又搞文艺奖金，派去游雁荡山后，连载了我那山水通讯。可忽然成为多余的人了，深深感到人生、命运的无常。

幸好“小树叶”刚由东京赶回上海。我们是注定不能有个家的。当时去南京的铁路已经断了，看来旱路是走不成了，只好走水路：由上海经香港去武汉。好在从1928年我就几番走过这条水路。当时从上海到香港的统舱票只要三四元钱，就赶快去买了两张。代售船票的旅社还叮嘱：现在黄浦江上正交着火，大船进不来，得坐小火轮去吴淞口外去搭大船。

于是，我又去杨树浦打听开往吴淞的小火轮靠哪个码头。当时我唯一的一只皮箱还是燕京毕业时斯诺送的，里面装着他一并送我的一些西洋古典著作。另外是一只柳条包。就这样，我就拉着比我更加迷茫的“小树叶”上了那挤得水泄不通的小火轮。船一开出“公共租界”，就进入了战区。炮弹从黄浦两岸在我们头上尖声飞过，江面上是一片硝烟。这时，舱里已挤不进去了，我们两人就躲在甲板一个角落紧紧抱在一起。她

浑身在打哆嗦。我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哼着电影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我的声音也是颤颤巍巍的。那可真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后来说起这事，她笑我当时是用颤抖的声音哼的那支英勇的歌子。

我们居然平安航出了吴淞口，靠近泊在那里的一条大船，船尾挂着花花绿绿的小旗。

我们这批惊弓之鸟就赶快抓着舷梯，攀了上去。这些统舱客中间还有七老八十的。风浪很大，快到香港的那个晚上，还死了一口子。亲属哭得死去活来，也不晓得尸首是怎么处理的。真是惨而又惨。

那是我头一遭到香港。码头上乱嘈嘈的，同杨树浦差不多。难民是没心情看风景的。我们不但人生地疏，而且言语不通。只好跟着人流涌向开往广州的火车站。

失业又逃难，当时一心一意只想在人间捞到一根稻草。到了广州，我们就咬牙上了辆计程车，去投奔位于东山的一家中学。那里有一位我曾叫过“姑”的，是那里的训育主任。1928年我就凭我的标准北京口音被汕头一家中学录用当上了一名国语教员。当时，我连中学还没毕业。如今，我不但戴上了学士帽，还曾出过几本书，并且为一家全国性大报编过两年文艺副刊，蛮以为凭这些谋个教职总不难吧！

谁想到时候不同了，人的关系也不同了。那位一向和颜悦色的“姑”一见我们这对投奔她来的难民，立刻绷起脸来。她甚至没让我们进去，就在门房外面厉声对我们说：这里没地方安插外江佬。她唯恐我们会赖着不走，所以连口茶也没给喝。

这样的“白眼”，我在1957年之后，又经历过多次。人一背时，行情立即一落千丈，这就是炎凉的世态。

偌大的广州，我们举目无亲，一路只好靠笔谈问路，居然又摸回到车站。我们又买了两张去汉口的车票，那里我认识汉大学的凌叔华。早年我曾要当个“少年漂泊者”。如今，真这么茫然地漂泊起来，可真不是滋味！

到了汉口，先在一家离江边不远的小客栈落了脚，然后就过江去珞珈山看望凌叔华和在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陈源。他们倒是很热情，但那样兵荒马乱的日子，大家都自顾不暇。武汉大学是挤不进去的。他们说，《大公报》在武汉出版了。那是你的老家，怎么不去投奔？

这倒是一线曙光。我赶快买了张《大公报》，按地址去找。一路上在纳闷：我是在天津进的报馆，一年后虽去了上海，可还兼编着天津版的《文艺》，而且编得也还热闹。怎么没找我！

我错了。武汉的《大公报》是张季鸾主持的。副刊改名《战线》，编者陈纪滢是他从东北找来的老部下。那里的门，对我关得紧紧的。后来我到昆明，可能由于读者一再要求，报馆又要我遥编《文艺》。编了没几期，我就去香港《大公报》了。——这是后话。

正当我困在小客栈里一筹莫展的当儿，忽然出现了一线曙光：从1930年一直关心我并把我引上文学道路的杨振声老师和我的另一位师傅沈从文先生由敌占的北平逃出了。当时三姐兆和带着龙虎幼子暂时还留在那里，但杨老师的助手汪和宗还是一道来了。

当杨老师晓得我们的状况后，没等我开口就说，那么就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吧，反正有你们饭吃，每月只能给五十元零用。沈先生自然也深表赞同。

这样就结束了我一生唯一几个月的失业。我们就像悬在